

经济学方法论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评《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

桂起权*

摘要：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在于科学哲学，传统科学哲学本身正在从“狭义”到“广义”进行拓展并且经受急遽的变化，还受到诸如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修辞学等学科的渗透和影响，它的方法论“工具箱”正在多样化。相应地，经济学方法论在最新发展中也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化。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新进展是：波普尔与拉卡托斯等人的合理要素在后继者中得到发扬；20世纪以来穆勒的方法论传统通过再分析又得到最新发展；罗森伯格的意向性解释模式受到关注；经济学模型和抽象化的技巧有新进展；当代实在论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发挥重要作用。经济学方法论的中心议题正在悄悄地发生微妙改变。重要的是，要对极其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观点兼容并蓄，要能够在汲取和继承传统的思想精华与不断开拓创新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 科学哲学 多元化 继承传统与更新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经济学界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兴趣因之与日俱增。在经济学界介绍科学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著与译著也越来越多。然而，由于国内科学哲学界与经济学界长期缺乏沟通，缺乏深入的思想交流，相互之间的不了解甚至误解时有发生，偶尔闹出点笑话来也不足为奇。这种情况就像我国在生物学哲学的译著中，把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翻译为“细胞理论”那样，很难怪罪于某个人。顺便说，在有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译本中就出现了一些奇怪译法，其误导作用是十分惊人的：哲学家马赫——变成了经济学家马奇；彭加勒的约定主义——变成了因袭主义；库恩的“学科模式”——变成了“有规则的矩阵”；波普尔所反对的“知识无谬论”——变成了“教皇无谬误主义”；科学实在论——变成了存在主义；克里普克的因果指称理论——变成了“参照物因果关系理论”；整体唯名论——变成了“全球经济唯名论”，局部唯名论——变成了“地方经济唯名论”，如此等等。如果头脑里没有自动纠错机制，那么根本就无法读懂这里的“经济学方法论”。

看来，读者迫切需要一本好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导论性读物。希望能够做到：概念要正确、清晰、明了，不要误导、歪曲、混淆，不要张冠李戴；既要有开放的心态欢迎方法论模式的多元化发展，又不要对优秀的方法论思想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否定态度。对不同学派的观点评价要中肯，要能够辩证地看待继承传统与更新传统之间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韦德·汉兹(D. Wade Hands)“Reflection without Rules”一书的中译本的出版(中译本取名为《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正好是与国内这种对经济学方法论日益增长的理论研究兴趣相呼应的，它恰恰能够满足广大读者的精神需求。

从字面上的意思看，“反思没有规则”，说的是对经济学理论的方法论反思并没有固定的规则可循。译者段文辉博士将它翻译为《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是十分贴切的，完全符合作者本意。作者韦德·汉兹作为经济学史理论家，说他熟谙经济学史那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对当代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有如此全面深刻的理解，我作为科学哲学学者对此不能不表示由衷的敬意。

马克·布劳格说过，原先所谓经济学方法论，就是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应用。然而，科学哲学本身(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正在经受急遽的变化，它变得更加具有开放性，并且受到诸如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的渗透和影响，它的方法论“工具箱”正在多样化。同样地，经济学方法论也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化。因此，

* 桂起权，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邮政编码：430072。

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很自然地,在本书中作者首先基于当代科学哲学的内在基础的微妙变化以及从“狭义”到“广义”的拓展,系统地讨论了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的最新发展;接着探讨与经济学方法论密切相关的、当代采用社会学视角来考察科学的所谓“科学论”(science theory),它从传统的科学哲学已经扩展到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修辞学等领域;然后再分析经济学方法论的中心议题正在发生微妙改变。这三项内容构成了全书的主线。

—

关于经济学方法论。在学习科学哲学的好学生眼里,狭义科学哲学的“方法论工具箱”里储存着许多可操作性的规则,它提供科学方法规范,可用以评判理论的优劣。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都属于逻辑主义的范畴,都有一套规范的方法论规则。与此相适应,在将科学哲学应用于经济学理论之时,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应当有助于把握经济世界的因果结构和运行机制,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方法论上的评价标准(这些看法尽管有点绝对化,但并非完全错了。)

在20世纪中期逻辑经验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科学哲学的正统观点,即“公认观点”。在逻辑主义内部,逻辑经验主义先是受到波普尔的批评,此后,它面临着以历史主义者为代表的反对派的一系列挑战就开始衰微并退出王位。主要的疑难在于,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观察带有“理论负荷”的问题,还有科学理论的经验基础的不可靠性,即所谓“反基础主义”论题等等,这些都是必须正视的。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学者正采取各式各样的方法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哲学学派更迭之快,像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科学哲学的初学者们往往会误以为,一旦前驱理论被后继理论所替代,就变得一无是处,也就是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人们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一边倒的思维模式,一个理论,说它好时就好得无可非议,反过来,说它坏时就坏得一无是处。在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表象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狂潮之中(这是一股强劲的冲击波),极端主义者企图解构原有价值体系中的一切。许多人都误以为,科学哲学真的只有过去,没有未来。诚然,回顾当年,逻辑经验主义在强调科学理论应当具有可靠的经验基础的时候,确实把可靠性、精确性绝对化了。反过来,历史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在强调“观察渗透理论”的同时,干脆从根本上取消了科学的客观基础。可是,本书作者韦德·汉兹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且似乎不断地在暗示我们应当学会辩证地看问题。

即使在经典的、正统科学哲学那里,仍然包含着十分有价值的思想遗产。韦德·汉兹注意到逻辑经验主义阵营并非铁板一块,而且其中不少人随着形势的变化在不断地更新和调整自己的观点。他多次引用维也纳小组核心成员纽拉特的“船上修船”的隐喻(甚至提到在纽拉特原著中“船的隐喻”有“五个不同版本”)。纽拉特说:“我们的科学不能建立在绝对坚实的基础上。我们实际的处境就好像,我们乘船在大海上航行,我们要在旅途中更换船的部件。”卡尔纳普和爱因斯坦都十分赞赏这一隐喻。作者还引用了波普尔的“沼泽地”隐喻作为参照。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说:“客观科学的经验基础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科学不是建立在坚固的基岩之上。可以说,科学理论的大胆的结构耸立在沼泽之上。它就像树立在木桩上的建筑物,木桩从上面被打进沼泽中,但是没有到达任何自然的或‘既定的’基底;我们只是在认为木桩至少暂时坚固得足以支持这个结构的时候停下来。”这句话说明对波普尔而言,科学的经验基础是可错的、约定的和理论负荷的。

总起来说,韦德·汉兹借助于“船上修船”和“沼泽地”隐喻,在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的两极张力之间达到了一种辩证的平衡。科学理论尽管没有绝对稳固的经验基础,却在动态变化之中可以有相对稳定并且相对可靠的、够用的基础,并且能够在前进中不断驶向理想的目标。于是,基础主义的合理成分、科学信念的合理性可以得到恰当的辩护。而且,在正统科学哲学中作为追求精确性、可靠性辅助工具的精致技巧——归纳概率逻辑被保留了下来。根据同样道理,反表象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合理内核都可以用“在两极张力之间寻求平衡”的模式得到正确解释。尽管作为机械反映论的照镜子式的“表象主义”已经过时,但是“建构”与“表征”毕竟是互动的,表征的客观基础却是取消不得的。尽管客观事物没有强本质主义所设想的绝对固定不变的、僵硬的“本质属性”,然而却可以有被维特根斯坦软化了的“家族相似性”,据陈少明和张志林在《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扩展研究》一书中的分析,可以有从本质₁、本质₂到本质₃

Hands, D. Wade, 2001. Reflection without Rules: 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78 - 79.

Hands, D. Wade, 2001. Reflection without Rules: 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92.

陈少明、张志林:《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扩展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排成由强到弱的谱系。

更一般地说,人类思想史的演进更像“滚雪球”,而不像“走马灯”。对于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后人通过“扬弃”的方式,在革新之中必有所继承,决不能否定一切。其实,库恩在名为《必要的张力》的文集里就已经把继承传统与革新传统的相互关系分析得十分透彻。就我本人而言,在阅读江天骥先生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1958)的50年后的今天,在历经后现代主义浪潮的洗礼之后,反而更加清楚地体会到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哲学究竟为我们留下多少方法论上的思想遗产。这是深有感触的。

话说回来,即使对于“后现代主义”那样激进的思潮,谁能说它没有一点儿积极的启发价值?因为它的“解构”功能毕竟非同一般。只要把握好分寸,“后现代主义”确实可以用作对消解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极为有效的解毒剂。当然,对“度”的掌握是至关重要的。列宁早就指出过,辩证法包含相对主义的要素,但决不能归结为相对主义。

按照传统的理念,科学哲学能为经济学家提供内涵丰富的方法论工具箱,此话不假。可是,随着方法论的开放和多元化,“严格按照规则办事”的信条被动摇了。作者韦德·汉兹正确地看到,反对僵化的固定规则,反对普遍有效性的乌托邦,决不是方法论的丧钟,而是一种思想解放,对此我深有同感。它使我联想到,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既非反对科学方法,也非反对科学本身,而只是反对科学霸权主义,但它却往往被人误解。“Anything Goes”这一个口号的本意,不是说科学家可以乱搞一气,怎么都行,而是说不同学派可以各行其是,各有各的道理。作者所谓经济学方法论原来的中心议题正在发生微妙改变。说的是,只要我们不是固守狭隘的方法论观念,那么将会发现,经济学方法论没有死亡,而且活得更好,更加丰富多彩,它为经济学的新的思考方式打开了大门。在这新的方法论思考中,我们需要超越过去,重新定向,进入一个全新的可能空间。汉兹搞活了我们的科学哲学理念!广义的科学哲学必将具有更光明的未来。

二

韦德·汉兹很重视前辈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并不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算了”。按他所做的概括,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进展主要涉及五个重要方面,它包括:(1)波普尔与拉卡托斯等人的经济学方法论在当代;(2)穆勒传统的再分析以及它在20世纪的最新发展;(3)罗森伯格对经济学的按信念、行动和欲望行事的意向性解释框架;(4)经济学模型和抽象化方法的新进展;(5)经济学方法论和当代实在论的紧密联系。

关于波普尔与拉卡托斯等人的经济学方法论在当代这个论题,笔者在《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一文中,也曾对此做过分析。那些科学哲学前辈们究竟为经济学家留下了哪些方法论遗产呢?其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1. 波普尔方法论包括三个主要合理成分:(1)流行的波普尔证伪主义。我们通过消除错误而学习,理性的批判的争论——重点在争论。波普尔有时候称此为“批判的理性主义”。波普尔本人明确表示过,他的思想真正关键是可错主义以及批判的方法。(2)波普尔的“境况逻辑”(即问题导向和形势分析)。经济学家从波普尔的境况逻辑中能比从其证伪主义中学到更多东西。联系经济学的应用,这种启发式的问题导向乃是每一位新古典经济学者心目中的第二天性。(3)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波普尔本人未必能自觉地意识到,在他思想中的这种辩证法成分比批判的理性主义、证伪主义更重要。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相应地就是苏格拉底的批判性对话与辩论。对于任何辩论,简单而可靠的方法是不存在的,成功的保证也是不存在的。正如博兰所认为,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乃是波普尔科学观的本质核心。可证伪性、制度分析、批判的理性主义都只是开胃食品,而不是主菜。

《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作者韦德·汉兹熟谙哲学家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标准解读,但是他更关注经济学家眼光中所重视的波普尔。他把“批判的理性主义和经济学”以及按照“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来解读波普尔,列入“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进展”的主要内容之一。

2. 科学革命论是库恩为经济学家留下的方法论遗产。若要理解经济学,人们还需理解经济学家共同体内隐含在相关工作之中的结构与策略。库恩提供了一套新颖的总体框架,它包含若干关键性概念:(1)范式——这是特定的科学家集团内部所特有的思想模式和总的概念框架,它是包括标准科学理论(即范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公认的试验手段、科学方法乃至价值观、哲学观在内的整个信念网。(2)科学共同体——指这样的科学家集团,他们从事同类的研究,受过相同的教育与专业训练,彼此了解,思想交流充分,在专业上判断比较一致。一句话,他们拥有共同的“范式”,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样。所以又叫做“学科模式”(disciplinary matrices,千万不可误译为“有规则的矩阵”呵)。(3)科学革命及其相关概念——新旧范式

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载《经济评论》,2002(2)。

间的转换称作为科学革命等等。

3.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简称 MSRP), 是备受现代经济学家青睐的另一套总体性概念构架。这个理论结构模型的特点在于: 一是研究纲领是由某种根本信念所支撑的整个理论系列组成, 它是开放的、可调节的。二是纲领具有精致的结构, 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层。硬核是纲领中不可触动的深层核心假说与根本信念; 硬核周围有一层由众多辅助假设所组成的保护带。面对反常情况和检验压力, 保护带可以通过调整辅助假设来消解反常, 维护硬核并促进纲领通过内部的理论交替而取得进步。研究纲领有进步与退化之分, 前者不断产生新预言, 后者丧失启发力。启发法规则还有正面与反面之分, 如此等等。

正如巴克豪斯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拉卡托斯主义遗产》(1994)一文中所指出, 纲领方法论在 1980 年代经济方法论研究热潮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布劳格在解读拉卡托斯时声称, 拉卡托斯有 80% 的波普尔成分, 20% 的库恩成分, 对波普尔的肯定有点过头。然而, 《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作者韦德·汉兹却更有理由认为, 正是拉卡托斯区别于波普尔的特异性才赢得经济学家的支持, 这就是: 存在不可证伪的思辨性硬核, 确证和理论进步都很重要。韦德·汉兹认为, 纲领方法论之所以有吸引力, 是因为它能为经济学家的实践活动作出合理辩护。若在经济学理论中运用纲领方法论, 举例说, “理性经济人的最优化”, 就是新古典纲领的一个硬核, 其反面启发法就是“不要建构非理性地行事的理论”。又如凯恩斯纲领在 1940 年代是有预言力的进步纲领 (它预言了新财政政策的成功), 到 60 年代却变为退化纲领。在分析经济学革命时, 拉卡托斯的纲领方法论比库恩的范式分析更为精细, 最好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总之, 科学哲学前辈们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决不是简单地被抛弃了, 而是被批判地汲取了。

三

经济学方法论的一系列新进展正在受到关注。

对于穆勒传统的再分析以及在 20 世纪的最新发展, 韦德·汉兹的研究也非常有特色, 有时甚至让我们得到意外的收获和惊喜。穆勒的名著《演绎和归纳的逻辑体系》(初版 1843 年, 完美的修订版 1884 年), 中国人严复早在清朝就有选择地进行过翻译, 名为《穆勒名学》, 但那时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它。韦德·汉兹通过对该书认真地再分析告诉我们, 穆勒作为“古典归纳主义”的主要代表, 同时又是经济学方法论上“演绎主义进路”的开创者, 他对于归纳与演绎的互动关系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这是闻所未闻的。

笔者进入辩证逻辑的学术圈接近 30 年了, 亲眼目睹着辩证逻辑学者处心积虑地反复琢磨着“归纳与演绎的辩证关系”。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穆勒对于归纳与演绎的互动关系会那么操心并且已经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在穆勒看来, “普遍命题仅仅是对已经完成了的从特殊到特殊的推理的记录而已”。原来作为演绎推理前提的普遍命题, 无非是归纳结果的纪录而已。演绎依赖于归纳, 演绎之中包含着几乎被遗忘、已经被扬弃的归纳! 在三段论大前提中已经暗中包含归纳的结果, 淡忘并非真正的抛弃。饮水思源, 演绎决不应该忘本! 三段论决不应该忘本!

也许辩证逻辑研究者可以通过韦德的媒介, 在穆勒那里找到自己“踏破铁鞋觅不着”的“关于归纳和演绎之间真实的辩证关系”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穆勒最基本的立场是: 在认识论上彻底的经验主义, 而在经济学上却采取先验方法, 两者是否相互矛盾? 如何协调? 穆勒甚至把“先验方法”称为“归纳与演绎的综合方法”, 为什么是这样? 穆勒说, 实践家需要的是具体经验, 他们完全从特殊事实出发, 向上论证某个一般理论。与此不同, 思辨理论家则先从特殊事实出发, 向上论证某个范围更广的一般原则, 再向下论证各式各样的具体结论。这两种方法的前者仅是归纳法, 也就是后验方法; 而后者则是“归纳与演绎的综合方法”, 也就是先验方法。简单地说, 经验归纳 = 先验演绎的基础。对于穆勒而言, 认识论立场才是根本的, 方法论观点只是认识论立场所派生的结果。认识论立场上的“后验/经验 = 先验的基础”, 决定方法论观点上的“归纳 = 演绎的基础”。

有意思的是, 韦德·汉兹还提供了如下的材料。原来, 老凯恩斯作为穆勒传统的现代继承者之一, 在其《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1917)一文中, 就经济学方法论的范畴之内, 也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对于“归纳与演绎”之间 (我们习惯于称之为) “辩证关系”的那种认识: “如果纯粹的归纳是不够充分, 那么纯粹的演绎同样也是不充分的。将这两种方法错误地对立, 似乎使用它们中的任何一方就会排斥使用另外一方, 这是非常普遍的。事实上, 只有将这两种方法公平结合, 才有可能使得经济科学得到全面的发展。”

桂起权:《穆勒经济学方法论传统的辩证解读》,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3)。

Hands, D. Wade, 2001. Reflection without Rules: 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The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1.

韦德·汉兹考察了 1980 年代以来“穆勒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演绎主义进路)的新发展,同时对经济学定律的趋向性质又有了新的解读。在 20 世纪后期,豪斯曼和卡特赖特两人可说是穆勒传统最重要的继承者和主要诠释者。豪斯曼的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将经济学解释为一门“不精确的独立的科学”,并且提出了细致判别趋势律的四条标准,即近似真理性、概率的可靠性、虚拟模态特性(趋向性)、宽容性即“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条款。科学哲学家卡特赖特最著名的观点是“潜能实在论”,她再次将本性、必然性和潜能(capacities,潜在能力,容量)等本质主义概念引进到科学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她主张自然实体、经济对象都拥有潜能——在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潜在的因果控制能力,潜在的各式各样的属性,这就像神话传说中的夏娃,在她的体内潜在地包藏着全部人类的种子或基因库一样!潜能或容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而经济学定律 = “趋势律”的根源就在于此。

经济学方法论的又一个新进展,是考察当代科学实在论与经济学方法论之联系。韦德·汉兹十分清楚,科学实在论者或者注重理论实体的实在性,或者注重深层次因果作用机制的真理性。然而,正统科学哲学家深受休谟主义的影响,常以发现表层的“恒常关联性”为满足,科学实在论者对此十分不满。在物理学哲学中新的理论实体(诸如夸克、黑洞、弯曲时空等等)的实在性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在经济学哲学中,理论名词指称的实在性(厂商、消费者、价格、利润等等)是不成问题的。其要害不在于实体的存在,而在于经济实体组织的方式,也即在于其中的因果性、规律性或真理。经济学中关于实在论的争论不是关于所讨论的实体之争,而是关于基本的因果机制是否已经被纳入之争。实在论的经济科学应当确认关于经济世界运行的方式的真理。

韦德·汉兹总是紧密联系经济学来考察实在论。一是考察近年来在经济学界广有影响的劳森的“批判实在论”,它发源于巴斯卡尔的“先验实在论”。巴斯卡尔的基本立场是本体论的和本质主义的,他认为,科学的真正目标恰恰在于揭示深层的因果机制,唯有它才是可变事件背后的基础并最终产生现象的规则。劳森的独特贡献在于,增加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本体论。劳森认为,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目标是确认所观察事件背后的深层结构和根本的因果力,而决不限于发现经验事件表层的“恒常关联性”。他的主要的推理模式既不是演绎也不是归纳,而是溯因。这种推理直接从现象层次追溯到相关的决定现象的因果机制。二是考察麦基的“真实实在论”。既然关于实在论和经济学的争论焦点不是在于实体之争,而是关于基本的因果机制是否已经被纳入。成熟的经济科学应当确认关于经济世界运行的方式的近似真理。三是作为参照,也简要地考察了博伊兰和奥戈尔曼在《经济学方法论新论》中所竭力推崇的“因果整体论”。此前范·弗拉森就认为,实在论具有独断论倾向,因为它对不可观察物有所断定。他的建构经验论所采取的策略是,只追求可观察、可把握的“经验恰当性”,对不可观察物既不断定其有,也不断定其无。因果整体论是一种新的理论尝试,它汲取并融合了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和奎因的整体论两者的优点。汉兹对因果整体论采取观望态度,他“拭目以待”。实际上,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两极张力中,汉兹也是尽力在寻求某种可能的、合理的平衡。

在韦德·汉兹的这本专著中所做的讨论,内容涉及极为广博的领域,除上文所述,还涉及经济学方法论的从自然主义转向,到社会学转向,再到实用主义的转向。自然主义转向包括奎因的自然主义,将认识论自然化;西蒙的有限理性、满意决策,以及认知心理学进路;还有波普尔的进化认识论,直至心灵哲学。社会学转向包括从默顿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到布鲁尔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以及SSK的经济学。实用主义转向包括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乃至经济学的修辞学。还有当代科学论与经济学的互动,科学知识经济学的产生等等。总起来说,有关当代多元化的经济学方法论,本书展示出一个波澜壮阔的场面。

总之,这是一部内涵深刻而富有启发价值的难得的著作,它以海纳百川的肚量,对极其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观点兼容并蓄,能够在汲取和继承传统的思想精华与不断开拓创新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无论对于经济学工作者、经济学方法论爱好者、科学哲学工作者以及一般的哲学工作者,或是不同层次的广大读者,都值得一读。

(责任编辑:彭爽)

桂起权、段文辉:《穆勒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进展——经济学定律的新理解》,载《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09(2)。

桂起权、段文辉:《当代科学实在论与经济学方法论之联系——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进展之一》,第五届全国分析哲学研讨会,杭州,2009年4月11-12日。

[爱尔兰]托马斯·A·博伊兰、帕斯卡尔·F·奥戈尔曼:《经济学方法论新论:超越经济学中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中文版,193-23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